

追懷一個「解衣衣我」的人：

憶念袁永馥先生

羅才榮

重慶陷匪，成都邂逅，一語轉變我人生，相偕飛離鐵幕。海口居停，同眠地上；華聯渡海，共望雲天：患難見真情，往事不堪回首憶。

星子承教，武漢追隨，從此決定我命運，大家參加革命，康渝騎角，攜手反共，台灣改造，同赴基層，復國正艱苦，未來頓感失瞻依。

這是我送給袁念勤（永馥）先生的輓聯，敘述了我和他許多生活的往事。他的生命力最強，臥病十餘年，臨危非常平靜，告訴他的家人要火化，不要用景行廳，骨灰要帶回大陸。

第一句，表示出他來時一生乾淨，去時也一生清楚。第二句，表示出他看透了人情的冷暖和榮辱。第三句，表示出他永遠不能忘去的心願。在治喪會的計文中，在朋友的輓詞中，大家流露出來非常痛惜的都認為是：他有才華潛力而沒有充分發揮，他曾掌握了權勢，而並未為自己打算。

他可以說得上是「照亮別人」的人。而今寂

寞地消逝了。

他得到的最後榮譽是國民黨中央常會決議給他「黨旗覆棺」，作為一個國民黨黨員，這一份榮譽是值得驕傲的，也是他應該的。

我是為他覆蓋黨旗的一位「覆旗委員」。我在一月十九日的日記上寫道：

「我為他覆上黨旗，我送他到火葬場。」

當方賢齊同志將黨旗交給他遺屬的時候，他的遺體正在烈火中燃燒。

我不禁潸然淚下。

他知道嗎？他的靈魂真的會在青天白日旗的覆蓋下安息瞑目嗎？我只有默默地祝福他。」

我和念勤先生在一起工作的時間很短，生活在一起的時間只兩個月，因為我們開始認識的時候，地位上有很大的差距，他是特訓班的上校主任秘書，我是訓育組的上尉課員，他是康兆民先生的親密幕僚長，我是康先生的學生。

在我的眼光中，他只是一個極有權勢的人物，和我扯不上什麼關係。

一直到抗戰發生，康兆民先生除了原任的軍

校特別班主任、別動總隊總隊長外，更兼理了統帥部第二廳廳長、留日學生訓練班主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籌備工作，和負責處理共產黨問題，為了綜合聯繫，特在漢口成立了一個「機要室」，念勤先生就是這機要室的主任。我亦調到機要室工作，也算是念勤先生的直接部屬。

機要室設在漢口一個私人的住宅裏，我雖然是當中的一份子，但是和念勤先生還是很少接觸的。

我的回憶：只記得機要室的伙食很不錯，樓下還有一間特設的彈子房，念勤先生公餘很喜歡打彈子，我也就常從彈子房的窗外走過望見他。機要室似乎不久就結束了，我亦調到青幹班受訓。

從青幹班出來，隨戰局的轉進，我到了重慶參加青年團重慶支團工作，念勤先生那時在中央團部社會服務處負責，後來又轉到西康支團部任幹事長，這一段悠長的歲月，我們亦很少見面，只在各種會議中拉拉手而已。

使我和念勤先生發生密切接觸和感情的，是在四川陷匪以後，這是一段不平凡的生活歷程。

重慶已成孤城，我還在楊森將軍的公館裏幫助他處理當時的變局，突然炮聲隆隆，電燈熄滅，各方告急的電話紛紛傳來，楊將軍同意我和他的秘書長李定宇先生先行撤離重慶，我和定宇先生乘吉普車經永川、銅梁縣、遂寧、綿陽到成都，當時是前途茫茫不知所歸。

在重慶時聽陳介生先生說，曾擴情先生正主持川陝邊區綏靖工作，有游擊作戰的準備，我到了成都便到處打聽擴情先生的消息，結果在一位姓黃的家裏找到擴情先生，我便向他表示準備追隨他打游擊的願望，曾先生說：

「慢慢談，你就在這裏吃了飯再說。」

當時擴情先生正在和四位朋友娛樂，對我的要求只漫然的應付了一句，我亦不便多說，就等着吃飯。

那是一間豪華的客廳，陳設高雅，四週花木扶疏，簷前鸚鵡朗朗在學人說話，我當時心境狀態真是度秒如年。

開飯了，佳餚滿棹，我早聽說成都是非常講究吃的地方，果然名不虛傳，當我看見擴情先生他們有說有笑的時候，真是有點悲感交集，好不容易飯吃過了，便抓着一個機會再向擴情先生提出我的願望，他只是說：

「好！好，明天我就要回綿陽了，你來吧！」
「我和曾先生同車去好嗎？」我以為這是很好的機會。

「不行！你去坐公共車吧！」

說完這一句話，他又去娛樂了。
我惘惘然離開黃家，想到打游擊是無希望了

，因為我寄希望的擴情先生，實缺乏戰鬥的心理準備。

失望之餘，在街上閒蕩，突然遇見念勤先生，相互談到彼此的現狀，我告訴他由重慶來成都看曾擴情先生的經過，他也告訴我在成都和我同樣的遭遇，我們得到一個共同的結論，就是自己的命運要自己把握，「才榮！我們弟兄自己幹吧！」念勤先生的語氣堅定而有力。

「好！」我在迷霧中算看見了一線曙光。
「我們怎樣去幹呢？」我懷疑地問他。

「先到軍校去看谷正綱先生再說，聽說谷先生隨侍 總裁住在軍校。」

我們到了軍校，和谷先生見了面，谷先生不等我們開口就熱情地說：

「你們來得正好，我正在整理黨務工作同志去台灣的名單，你們要去，我就簽報 總裁。」

「去，去，去！」我們兩人急促地並未商量竟同聲一齊表示願意去台灣！

「那麼，下午來聽消息吧！」
在那緊張時刻，只能這樣簡單的說幾句話，我們就告辭谷先生了。

出了軍校，很輕鬆的到「不醉毋歸小酒家」吃了一頓午飯，又到少城公園吃一片刻茶，直到下午三點再去軍校，谷先生說：

「總裁已經批准你們兩個去台灣了，不過，除了你們兩張飛機票外，要為我將總裁批准給青年黨人士和潘文華兩夫婦的飛機票送給他們。」

我們接受了任務。
由軍校出來，在交通十分困難的狀況下，先

到余家菊先生的家，把飛機票交給他分發，我和余家菊先生是第一次見面，當時他的客廳裏坐滿客人，可能都是青年黨的高級幹部，見到我們送飛機票來，情緒激動，使我深深的感覺到 總裁照顧友黨的誠懇和關切。在這樣困難的時候，還不忘去這一羣在民主戰場上比肩作戰的盟友。從余先生家出來，我們再到潘文華的公館。

是一幢豪華的住宅，庭園很大，濃陰覆蓋，奇花吐豔，香氣撲人，而且戒備森嚴，如臨大敵，衛士們都鎗口對外。

我們對衛士表明是 蔣委員長為潘主任送飛機票來的，他們起了一陣疑懼，相互耳語，才答應為我們通傳。

等了好一會，裏面傳出話來，放我們進去。
我們見到的是潘文華秘書長鄧漢祥。

他態度非常客氣，經我們把話說明之後，鄧漢祥似乎早有準備的從容說：

「謝謝 蔣委員長對我們主任的關懷，主任因為心臟病很厲害，不能長途飛行，目前還在看醫生，所以不能親自接待你們，非常抱歉。」

「主任身體不適，可分段飛行，第一站是海口，休息幾天再飛台灣。」我作以上的解釋。

「飛海口也要六、七個小時，對於心臟病人是不適宜的。」鄧漢祥的態度很堅決，並把兩張飛機票退還給我。

我接過飛機票，正準備告辭，念勤先生突然提出一個要求，念勤先生說：

「鄧秘書長，主任因病不能走，我們同去報告就是，不過我們有一個不情之請，明天早上能

不能派一部車子送我們到飛機場？」在當時交通狀況之下，要我們自己設法去成都郊區幾十公里以外的雙流飛機場搭飛機，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念勤先生這一要求，真是把握了最好的機會。

郭漢祥稍一猶豫，馬上答覆：

「謝謝你們，希望報告 委員長的時候，多為我們主任解釋幾句，並請特別轉達主任感謝委員長的關懷之意，至於派車送你們去飛機場，很簡單，不過出發的時間太早，你們可否就在我們主任公館裏住宿一夜？」

我們立即同意搬來潘公館寄宿並告辭郭漢祥出來。

離開潘公館，馬上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這兩張飛機票怎樣辦。

在當時，成都新津飛機場擁塞了奔向台灣的黨政同志，取得一張飛機票是太不容易了，有的花上幾十兩黃金才得到一個機會，有的上飛機必須拋棄家人或放棄攜帶行李，這兩張飛機票，如果作自私的打算，給我，可以帶走妻兒，給念勤先生可以帶走兩個他的好朋友。

但是，念勤先生很肯定的告訴我：

「送潘文華飛機票，我們只有送還谷正綱先生才對」。我亦贊同。這一點，可以證明念勤先生是處事方正，不是自私自利的人。

我們趕到軍校已近黃昏了，谷正綱先生接到飛機票說：「這樣晚了，送給誰呢？」

以谷先生的態度來看，這兩張飛機票，我們如何處理，他決不會有意見的。至今，我們仍不知道這兩張飛機票谷先生轉送了誰，不過，我確信

由於這兩張機票，今天台灣一定多了兩位自由鬥士。

當天晚上，我們住進了潘文華公館的花廳，念勤先生住一間單人客房，我和啓琳住一間雙人套房，夜間，窗外望去是朦朧樹影，天上亦沒有月光，沒有星，只有寒風吹着紙窗吱吱地響。

臥具都是極精緻清潔的，好像住進結婚的新房。

真想不到在逃難離開大陸的前夕，我和啓琳還有這樣溫馨舒適的一晚。

把行李放置妥當，準備就寢，衛士就來請吃宵夜，可見早有準備，且吃的都是成都小吃的精品。

一夜不能成眠，天尚未明，衛士就來叫我們起床，並為我們一個人準備了一碗酒釀荷包蛋，很客氣的說：「請先生太太用一點，早上天氣冷，吃了酒釀就不會冷。」

吃了早點，一輛豪華轎車已經停在庭園門前等我們，我們就上車直駛雙流機場，一路上街道清靜，沒有行人。

出城門，守城的衛兵舉手示意停車檢查，司機很神氣的說：

「是潘主任送客人到飛機場。」衛兵即立正行禮，我們也就昂然過去了，當時成都還是四川軍人控制的局面。

出城不久，追上了一長列的車隊，司機告訴我們，我們車的前面一輛車就是劉文輝的座車，同時告訴我們，劉主席還有那許多車上的人，也是今早晨比我們早一點從潘公館出發的。他們好

像開了一晚的會。

後來我們到了海南島，在報上才知道就是我們離開成都那一天，四川的軍人政客，由劉文輝領頭，在新都發表附匪的宣言。我們遇上他們，正是向新都出發。他們晚上開會，我們正是他們鄰居的客人。真是我和念勤先生離開大陸時一段不平凡的險遇，幸好沒有被他們抓去祭旗。

到了雙流機場一望白霧茫茫，在霧中隱約看見一架飛機和一些人影，車子駛到飛機旁邊停下一羣同志十分關懷，特囑空軍由新津機場調一架飛機到雙流機場來運送我們，免得擁擠紛亂，谷正鼎先生是以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身份擔任領隊。

在飛機旁邊的同志們，對於我們乘坐豪華汽車來搭機已經驚奇了，再發現啓琳是來送機的而不是和我同去台灣的，更感到莫名其妙，我們無法解釋。看看同機的人有鄭彥棻先生、傅啓學先生、陳泮嶺先生一家人，胡軌先生一家人，和四川同志吳熙祖等數十人。

飛機上還有空位，我目送啓琳車子消逝在迷霧中以後，真後悔為什麼不要求谷正鼎先生同意啓琳同行，可是飛機已離地起飛了。

下午到達海口，住進海口市黨部，我和念勤先生還有傅啓學、吳熙祖等幾個人自然生活打成一片，同隊在一間辦公室的地板上，窗外不遠就是大海。

海口只用現洋和港幣，念勤先生自然成為我們的領袖，我們每次上館子，一個人湊一塊大洋，交念勤先生主持點菜，他一定要點一盤「炒菜

遠」，爲了省錢給我印象很深。從那時開始，無論什麼集體行動，都由念勤先生指揮。

在海口這一段時間，我們是空虛、徬徨，還有一點幽怨。每天晚上睡在地板上，天南地北的談一些有趣的故事，念勤先生亦經常是主講人，十分有風趣，使我對他過去是權勢人物的看法有了轉變，因爲權勢人物多半是裝模作樣的。在海口



袁永貞先生與夫人馮元璋女士合影。

有船去香港，許多有辦法的朋友（辦法就是自己，有錢而在香港又有朋友）都紛紛去了香港。我們這一羣，只有死等在海口，因爲沒有錢，在香港亦無朋友，日夜盼望台灣的消息，那時候，中央黨政機構滯留在海口的公務人員不下數千人。好容易傳出消息，台灣派出一艘華聯輪來接運我們。我真難忘離開海口的那一天早晨。

我們是在黑夜裏坐上上海南特區公署派來的卡車前往海邊一條長長的公路橋上的，當時只見橋頭到橋尾閃爍着許多手電筒的光，人影幢幢，人聲噪雜，只有接近的人才看見他的表情都是非常嚴肅的。

天一拂曉，看見橋上到處都飄揚着白色的旗幟，上面寫着機關的名稱，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五院以及各部會都有，算得上是中央臨時政府，每一旗幟下都聚集一堆人。這是大陸淪陷大撤退的最後一幕，有秩序也十分悲壯。

各單位推有代表會商一切有關撤退的事情，主持的人好像是經濟部的一位官員，他聲音宏大，奔走不停，可惜我不知他的姓名，很難得，在這樣混亂緊急的時候，還能維持着黨政的體制，輪位照職級分配，念勤先生是中央委員，我是候補中央委員，所以在黨部分得的輪位中，我們被分別分到特等輪和頭等輪。因爲沒有碼頭，華聯輪停在離海岸很遠的地方，要用小木船接援。

我和念勤先生及其他幾位中央委員被公推首先上小木船前往登輪。我們是西南地方生活習慣的人，並不怕水，幾位北方籍的委員就遲疑了！念勤先生在這樣的關頭，充分表現出他的堅定力和說服力，我們才上了小船向華聯輪划去。

風急浪大，小船起落的差度很高，首先是有些同志受不了主張回岸去，念勤先生苦口勸阻，穩定了大家的情緒，隨後駕船的人也表示有困難，不能前進，像這樣大的風浪，就到了輪船邊亦靠不攏去，經他這樣一說，本來就心理動搖的人，更堅決要回岸了，念勤先生一面勸慰，一面與船家交涉給他們格外的報酬，希望他們繼續向前划去，結果，每人湊出了一塊大洋，大約二十多元，船家又鼓棹破浪前進了。事後念勤先生告訴我，水滸傳上浪裏白條張順不亦是如此敲詐渡客嗎？我才明白！念勤先生不但有組織力、鎮定力，還有人性弱點的分析力。

到了華聯輪邊，看見上船的扶梯懸空掛得高高的，船家告訴我們：「必須先請預備登輪的客人，站在船頭，當小船接近梯邊，立即隨着海浪將船頭掀起和扶梯平行的一瞬間馬上拉着扶梯的鐵鍊跨過去，人一跨上扶梯，浪亦會落下去的，並被海浪反擊力推開輪船很遠，要再慢慢划過去，再等海浪掀起船頭的時候再跨上一個人。這樣動作很驚險，不能有一點疏忽，如果失足落到海裏便沒有生命了。」當船家說完了這一個登輪的過程以後，大家都面面相覷，船家似乎發現我們有點懼怕，接着又說：「站在船頭的人，我可負責攙扶，絕沒有危險，但是，一定要一個人先跨

上扶梯作接應工作，當船頭波掀起來登輪的人伸出手拉扶梯的時候，在扶梯上的人應馬上用手接着手，我再順勢一推就上去了，這樣很保險。」念勤先生聽了船家的話，便自告奮勇首先跨上扶梯，再一個一個的把我們平安的接應上了輪船，我才又認識念勤先生具有冒險犯難和犧牲奉獻的精神。

在船上念勤先生一個人住一間特艙，與傅啓學先生為鄰。我住的是雙人艙，和王元輝先生在一起，吳熙祖他們就住在統艙裏了。

華聯輪是客運輪，設備相當豪華完備，特等和頭等都是吃的西餐，統艙就吃中餐，在海口同臥一塊地板的朋友，在這種分級的辦法下，不能不分開了，但是每天我們還是到念勤先生的房間裏小聚。

晴空萬里，海浪不興，三十九年的元旦，我們在海上渡過，劫後餘生，一方面懷念大陸家人，一方面幻想台灣未來的歲月不知如何過去，我們的情緒徬徨而感傷。

船到基隆，我一看見海關屋頂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說不出的激動，好像人生再世一樣，而且發生一種安全感。

大家紛紛準備下船，都到船欄邊探望有沒有來接的親友。我是很少朋友在台灣的，縱有朋友亦不知我今天到達基隆。

念勤先生亦到欄邊探望。

「有朋友來接嗎？」他親切的問我。

「沒有。」我木然的答覆他。

「那麼，和我一齊上岸吧？可能翁寧三會來

接我，我在海口有信給他。」

在念勤先生的口中，我才知道翁寧三先生在基隆麵粉廠作廠長，他在政校特訓班受訓時，我亦在班中服務，因為翁先生是兆民先生的老幕僚，我早知道他的名字。經過一陣騷亂，終於發現翁先生在碼頭上正在搜尋念勤先生，大家接觸後，寧三先生亦自動邀我一同上岸。

廠長官邸是日式房子，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見日本房子，除了花木扶疏，門窗精細，塌塌米乾淨外，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清理廁所也有一張印得非常精美的日期表。

下船的第一餐，豐富、美好。當天晚上，我和念勤先生同臥在塌塌米上，窗外吹來夜來香的幽香，虫聲唧唧，輾轉不能入睡，大家談起家人來，都非常失悔，台灣有這樣安定的環境，我們竟把家人拋棄不顧，……我們都起了和家人聯繫的念頭。

第二天，吃早餐的時候，和翁寧三先生談到我們的心事，寧三先生便鼓勵我們寫信要家人來，並且告訴我們他有一位本家在香港可以轉信。我和念勤先生便各別寫了一封信回四川。

啟琳就是接到我這封信才計劃逃出竹幕的。

現在回憶起來，我們一家人在台灣過着非常圓滿愉快的生活都是念勤先生給我們的。因為，沒有念勤先生，到了基隆我不會住在翁寧三先生家中一宿，沒有這一宿，就不會得翁先生的幫助，和啟琳通訊聯絡上，那啟琳亦無法逃到香港，轉來台灣了。人生的遭遇非常離奇，一個人的命運安排亦是很巧妙的。

寫好信交郵之後，我們便離開翁宅，搭公共

車去台北，在船上負黨工同志聯絡的人便已經告訴我們，到了台北可住在台北市黨部，是中央黨部指定的臨時招待所。住進台北市黨部不久，念勤先生因為朋友多，一兩天之後都聯絡上了，還有些朋友是來台灣接收的，生活環境比較好，都邀請念勤先生到他們家去小住。

我們分手的時候，念勤先生拿出一套呢中山服給我，他說：「我的朋友比較多，好想辦法，我看你衣裳太單薄了，這一套衣服你就留下穿吧！」記得當時我只穿有一套藏青色的夾西裝，也沒有大衣，台灣雖然是亞熱帶，冬天還是非常寒冷，這一套呢中山服，真給我不少的溫暖。

後來我奉派到東部防守區擔任政治部主任，沒有軍服，就穿上這一套中山服去參加佈達式。

那是一個峭寒的早晨，天尚未明，我站立在花蓮花崗山的司令台上。

關司令官漢鶚佈達說：「奉參謀總長周上將命令，派羅才榮為……」

我一面聽着佈達詞一面想到黃呢中山服，更想到念勤先生，如果不是有這套衣服，我今天不是要穿西裝上場嗎？必成為軍中流傳的笑話。

真真說起來，我和念勤先生從軍校拜訪谷正綱先生到台北市黨部分手，時間不到兩個月，這兩個月，使我認識了一個人格最完整的人，這個人充滿了對國家的責任感，對人的關懷與熱愛，他鎮靜、堅定、勇敢、容忍、安份而能自我解釋一切，這許多優美的品質，聚集在一個人身上是太不容易了，我真不能忘去這樣一個「解衣衣我」的人。我一定要協助把他的骨灰運回大陸，正如我和他同來台灣的時候一樣。